

ZHONGHUA RENMIN
GONGHEGUO ZHUANTI SHIGAO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专题史稿

(1956~1966)

主 编 郭德宏 王海光 韩 钢

II

曲折探索

QUZHE TANSUO

顾问：龚育之 李君如 石仲泉

策划：李正培 何志勇 解 伟

中华人民共和国

专题史稿

主 编 郭德宏 王海光 韩 钢

曲折探索
(1956~1966)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 卷2, 曲折探索/郭德宏主
编.—成都: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4.4
ISBN 7-220-06676-7

I. 中... II. 郭... III. 中国-现代史-研究-
1956~1966 IV. K27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01164 号

ZHONGHUARENMINGONGHEGUO ZHUANTI SHIGAO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题史稿 (卷二)

——曲折探索 (1956~1966)

郭德宏 王海光 韩 钢 主编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周 颖 庄学君 何昌宇
何东琳工作室
杨 潮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盐道街 3 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booksss.com>
E-mail: scmchsf@mail.sc.cninfo.net

发行部业务电话

(028) 86661236 86650010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 86679239

印 刷

四川锦祝印务所 (028-85910167)

开 本

890mm × 1240mm 1/32

印 张

24.625

插 页

6

字 数

593 千

版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20-06676-7/K·968

定 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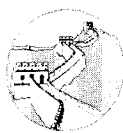
380.00 元 (卷 1~卷 5)

■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目 录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	林蕴晖 (1)
50 年代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尝试	熊亮华 (31)
50 年代党内关于建设速度的一场分歧和争论	熊亮华 (64)
知识分子会议和“双百方针”的提出	朱兆中 (89)
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	韩 钢 (119)
“大跃进”运动的发动和高潮	谢春涛 (188)
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肖冬连 (216)
庐山会议和继续“大跃进”	谢春涛 (253)
50 年代台海危机和统一祖国的努力	宫 力 (279)
中苏在防空协定、长波电台及联合舰队问题上的分歧	沈志华 (298)
平定西藏叛乱	杨贵华 (331)
新中国解决边界问题的努力和中印边界战争	许剑波 (362)
60 年代中国对外战略方针的演变	李向前 (390)
1961 - 1963 年中美大使级会谈	牛大勇 (416)
60 年代前期的国民经济调整	韩 钢 (442)



七千人大会的前前后后	张素华 (480)
“阶级斗争为纲”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金春明 (511)
60年代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王海光 (548)
60年代前期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批判	戴知贤 (602)
“三五”计划的编制和变异	陈东林 (633)
三线建设的决策和实施	陈东林 (669)
“农业学大寨”运动	郑有贵 (702)
曲折发展中的军队建设	于化民 (731)
“两弹一星”的研制	董志铭 (762)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

林蕴晖

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要走自己的路，是在1956年就提出来了。从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中共八大，到1957年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可以说是这个阶段中共党内思想最活跃的时期。其中许多重要的思想和政策，虽然在其后实践中并未得到很好地贯彻并坚持下去，但终究为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迈出了极其可贵的第一步。

苏共二十大与思想解放

50年代初，当我国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候，把社会主义看成是：经济基础——生





产资料的单一公有制和统一的计划经济；上层建筑——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即大体上是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这基本上可以说是全党的共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几乎是难以完全避免的。

苏联在 30 年代中期宣布建立了社会主义以后，经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严峻考验，打败了德国法西斯；战后不久，又成功地试验了原子弹和氢弹，打破了美国对核武器的垄断局面。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它的优越性。

1953 年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内部长期积压的矛盾和问题逐步被揭露了出来。这首先是农业远远落后于工业发展和人民生活需要的矛盾，1952 年粮食的计划指标为 92 亿普特，实际产量只有 56 亿普特；1953 年粮食采购总量只有 18.5 亿普特（仅相当于 1948 年的采购量），较之 1952 年减少了 12.7%，而粮食消费量较 1952 年则增加了 6.6%，国家的粮食缺额达到 16 亿普特。证明马林科夫在苏共十九大报告中宣布的：以前认为最尖锐、最严重的粮食问题，依靠农业集体化，已经“顺利地解决了，彻底而永远地解决了”，这个赢得大会“暴风雨般的经久不息的掌声”的结论，完全是对斯大林搞个人迷信的神话。接着是 30 年代以肃反名义造成的大批冤案开始悄悄平反。1956 年 2 月举行的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进一步揭露了苏联社会存在的矛盾和斯大林的错误。指出：

在国家权力方面，过去把一切权力都集中在中央是不对的。要维护和加强各加盟共和国的权力，把属于他们权限内的事务交给它们自己处理；与之相应的是，把中央所属的大量工业企业转交给地方机关管理，加强地方苏维埃和企业的权利。

在农业方面，要改变农业计划工作的安排，取消一切由中央来制定计划的那种官僚主义的有害的做法，把拟定具体种植计划的事

情交给集体农庄自己去办，而中央只是规定由国家征收和收购产品的数量。

在思想理论方面，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关于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将使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增长和技术进步停止下来的论点，未必是正确的。在理论宣传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搬用旧的引语、公式和原理的教条主义。

赫鲁晓夫在他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中，更揭露了斯大林破坏社会主义民主，践踏社会主义法制的严重错误。

这样，苏共二十大就打破了长期把斯大林神化了的教条主义禁锢。像斯大林这样的伟大人物也犯有错误，苏联的社会主义也不都是那么完满的。使人们意识到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并没有终结，共产党人在各自国家如何搞社会主义还有待自己在实践中进行探索。这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思想解放。当时，中共中央领导人对苏共二十大破除了斯大林迷信的积极一面作了极高的评价。1956年9月，中共举行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毛泽东在会见南斯拉夫代表团时说：对斯大林批评，我们人民中有些人还不满意。但这种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①。周恩来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代表团和新西兰共产党代表团时一方面指出：“批判斯大林被资产阶级利用了，给有些兄弟党带来一些困难。这次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准备是不够的，是在气愤的情形下宣布的。”同时，非常明确地说：“破除对斯大林的迷信，苏共这样做是很勇敢的，是有贡献的。各国共产党的思想都动起来了，不沉闷了。大

^①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6-127页。



家的思想也解放了，这对各国党是个很大的进步。这是共产党的思想解放。”^①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中共中央领导人提出了“以苏为鉴”的问题。

八大指导思想的转换

为准备召开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提出八大的指导思想是继续反对右倾保守。1955年12月5日，中央政治局召集有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到会的有在京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100多人。刘少奇主持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准备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意见，即：八大的中心思想是要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要保证15年同时争取15年以前超额完成。刘少奇提出：要全党准备八大，迎接八大，使八大开好，使八大的准备工作和各地方各部门的工作结合起来^②。周恩来在1956年1月举行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也传达了这个精神。他说：党中央决定，把反对右倾保守思想作为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问题，要求全党在一切工作部门中展开这个斗争^③。

关于八大的准备工作，中央明确分工：刘少奇负责准备中央委员会向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周恩来负责准备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报告；邓小平负责准备党的章程的修改报告。把反对右倾保守作

①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20、621页。

② 《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47页。

③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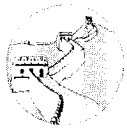
为八大的中心思想，大家是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的。但在进行具体工作时，并不是盲目行事。在12月5日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座谈会结束前，刘少奇向到会者宣布：为起草中共中央向八大的报告，准备找各部门的同志谈话，请各部门同志预作准备。

据资料记载：从1955年12月7日到1956年5月28日期间，刘少奇先后约请中共中央、国务院37个部委局的80多位负责人到他住处的会议室，请他们汇报本系统的基本情况和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事关全局的问题。汇报座谈，经常是从白天一直到第二天凌晨，他亲自记笔记，不时地提问、插话，同部长们讨论，一起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提出了很多重要意见和见解^①。如强调：

好的传统技术不能丢。他说，轻工业与手工业有密切的关系。中国有不少手工业的技术很好，应该把轻工业的制造技术与手工业结合起来，不要抛弃本国的传统基础，什么都学外国。不要因为搞机器工业而把手工业打倒，要接受手工业的优良技术和传统，如果结合起来，在中国手工业基础上发展、提高，有很多产品是可以超过世界各国的。

刺激消费促进生产。他说，纺织品和针织品的品种花色要增加。不断增加品种花色，用刺激人民更高的消费欲望来促进生产是进步的，这和腐化不同，腐化是妨碍生产，破坏生产的，而刺激生产则是进步的。花色品种要注意。要专门搞个机构，把技术高的手工业者养起来，他们有新创造就马上奖励。妇女穿什么衣服好，鞋、帽等等如何改变样式，他们会设计。搞社会主义，不能把这些东西都搞掉。新产品要有专门的部门来管理。比如说皮鞋，捷克斯

^① 《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47—368页。



洛伐克有几百种样子我们就统统买来看看，全世界的鞋买来看看，然后再来设计，搞出各种式样的产品来。为了研究新产品，要把资本家中会搞设计的人养起来。服装设计也要搞，想花样很重要，不要以为搞时装就是资本主义。

建设的投资重点。他认为：今后投资的重点有两个：一个是重点建设，一个是利润大、生效快的事业。因此，他指示：沿海不进行基本建设，但也不要限死。投资少、回收快、发挥潜力大的，还是可以搞一些。

要照顾农民的利益。他提出：农业合作化以后，粮食征购制度如何改变值得慎重研究，我国和苏联情况不一样，不要单纯学苏联的经验。我们的公粮制度好，群众习惯，国家不出钱，群众无意见，如果和征购合并成一个制度，征购粮就必须降价，农民就会有意见。粮食的定产、定购政策，还是肯定三年不变，销量如果要增加，可根据统购后市场收购的情况来定。城镇定量供应的制度今后不公开取消，情况好就松点，情况不好就紧点。

要学会做生意。少奇认为，商业要很好地为发展生产和改善城乡人民的生活服务，可以把有经营经验的资本家请来当顾问，要把资本家做生意那套长处学过来。社会主义商业现在存在着不灵活性，愚蠢性，不能适应地方情况的变化。这一点我们不如资本家，他们灵活得很。解放以前没有全国市场，仗打完后有了全国市场，地区差价也大了，私商赚了很多钱。做生意的人要很灵活，很敏感。他建议把全国商人中最有经验的人组织成为总公司或地方商业厅的顾问或聘为参事之类，可以起两个作用：一是统一战线的作用，一是向他们学习；他们是我们的先生、前辈。我们要把资产阶级的长处吸收过来。

要重视运用市场调节。他认为流通环节很重要，应该运用价格

政策来调节和刺激生产。他说,农产品采购是个带关键性的机构。采购工作不只是个采购的问题,而且要通过采购来指导生产。采购部门只要能做到保证收购,保证价格,指导生产方法,就能促进生产的发展。他还认为,预购、赊销是一种信用制度,银行不要去禁止,而要支持它的发展。有时是先收购农民的农产品再给他工业品。有时是先给了工业品再收他的农产品。中国早有这种习惯,这是个好制度,应该提高这一制度成为国家制度。

劳动制度要改革。他认为,现在采用固定工与临时工的办法是错误的,临时工到处呼吁转正式工,使企业背包袱。过剩的劳动力应由国家负责,不能叫企业包下来。今后新工人或学徒都应实行合同制。签订一年或两年合同。

要重视新技术重视人才。他提出,要敏感地注意世界上最新的技术,新式的机车可以花钱买,可以仿造,自己试验。邮电部门是技术很高的部门,特别是电讯方面,必须采用最新的技术。究竟采用那些新技术,要好好研究。采用最新技术,就需要加强科学研究。科学研究不是只靠自己搞,主要是好好向人家学习,把人家最新的科学技术学到手,自己再搞就有基础了。向人家学习,不只是向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学习,也向其他国家学习。为此,他强调要重视技术人才,善于发挥他们的作用,并给以合理的待遇。他说:多吸收一些专家参加部领导,让他们挺起胸膛讲话是有点好处的,一是把外行变内行,一是把内行变为红色专家。技术人员的工资可以高于部门或企业的领导人。如果是真正有技术的,工资可以高于厂长、部长甚至主席。为造就大批国家建设所需要的人才,他还阐述了发展中学教育和高等教育的紧迫性。

要有利于百花齐放。当时,受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影响,文化艺术界也刮起一阵把民营剧团一律改造



为国营的风。针对这种现象，他指出，几千个剧团都国营，会搞掉积极性。这不是促进，而是促退。该搞合作社，而搞了国营，这就是“左”。任何事情都一样，没有明显的优越性，不要去改，至少慢一点改。要让民间职业剧团再搞它一个时期。他说：我们的方针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但“出新”不能勉强。文艺改革必须经过一定的努力。没有怀孕就要生孩子，这是不可能的。百花齐放，就要允许并存，各搞各的。戏改不要大改，有害则改，无害不改。有些老戏很有教育意义，不要乱去改。不要犯急性病，不能过早地改，改得不要过分。对文艺创作，对作家的作品，党与政府采取政治上的干涉，有的是应当的，就是干涉得对的；但是也有的干涉是粗暴的，或者干涉错了的。以后如果这种干涉是正式代表组织的意见，就应有一个正式决定，来一个正式文件。作家如果不同意，可以把决定连同自己的意见寄到中央来。或是寄到文化部、宣传部、作家协会，都可以。作家不能不让人家提意见，不让人家讲话。自由论争就是要大家讲话。有的意见是负责同志讲的，这些负责同志的话，也应该看做是读者、观众的意见，尊重他们的意见，是完全应该的，但作家不一定要按他们的意见那样修改，作家如果不同意可以不改。如果是政治上的错误，那就要做出决定，有正式文件。没有正式文件，你可以只当做个别意见，可以不听。

新闻广播要客观公正。他说，新华社要学习塔斯社，同时也要学习资产阶级通讯社。马克思说过，资产阶级的工厂要接受下来，资产阶级的政治经验也要接收下来。新华社要成为世界性通讯社，新华社的新闻就必须是客观的、真实的、全面的，同时必须是有立场的。和其他通讯社相比，尽管观点不一样，但是新闻报道是客观的、真实的、公正的、全面的，这就能在世界上建立威信。现在的新闻报道有偏向，只讲好的，有片面性。应该是好的要讲，不好的

也要讲，讲坏的，不是什么都讲。什么都讲是客观主义，是有闻必录。要经过思考和观察，有自己的见解。他还指出：广播跟人民思想、人民生活、人民需要有密切的联系。比如说，时装展览会，人民对它有兴趣，应该广播。又比如说，发现大脑炎、猩红热，可以请卫生部门广播一些预防常识。看起来是人民生活琐事，但很重要，这表示人民广播电台很关心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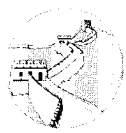
刘少奇的这些谈话，很显然已经毫无反对右倾保守的气息，而是从如何更好地发展社会生产力，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质量等等方面，提出了新的思考。

就在刘少奇听取各部委汇报的过程中，毛泽东得知此事，很感兴趣，他让薄一波也为他组织安排。因此，自2月14日至4月22日亦先后听取财经方面29个部委和国务院主管经济工作的五个办公室负责人的汇报。其间3月18日、20日、21日、26日，4月9日、10日，刘少奇参加毛泽东召集的汇报会，一同听取林业部、国家气象局、中共中央财贸工作部、商业部、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负责人的汇报。正是在这次漫长的调查研究基础上，经过中央政治局的多次讨论，形成了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十大关系的报告，接着又在5月2日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形成了后来正式发表的《论十大关系》^①。这既是由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集体参与的产物，更是由毛泽东最后概括的代表作。十大关系，有五个是经济关系，五个是政治关系。

经济关系，核心是重工业、轻工业与农业的关系。在新中国成

^①《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24页。



立之初，在考虑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时候，刘少奇曾多次谈到，中国搞工业化，要从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起步。后来，由于抗美援朝战争，更由于原有工业的落后，因此，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选择从发展重工业起步是对的。问题在于，在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的总口号下，把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绝对化，认为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还是优先发展轻工业和农业，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两条不同的发展道路。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表明，片面地强调重工业，必然导致牺牲轻工业和农业，其后果是：苏联的粮食长期达不到革命前的最高水平，东欧国家由于轻重工业发展不平衡产生了严重问题，因而市场上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形成了一种短缺经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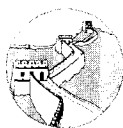
鉴于这种教训，毛泽东认为，虽然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做得好些。我们对于农业和轻工业是比较注重的。我们的民生日用商品比较丰富，物价和货币是稳定的。但他明确指出：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毛泽东说：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这就从只有优先发展重工业才是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教条中解放了出来。

第二个重要思想，是讲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毛泽东说，我们过去常说“军民兼顾”、“公私兼顾”。鉴于苏联和我们自己的经验，今后务必将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

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这两种关系处理好。就是说，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就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要给工厂和合作社一点独立性。毛泽东说：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从原则上说，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至于同农民的关系，毛泽东认为，苏联的办法把农民害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得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毛泽东说：我们对于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我们的农业税历来比较轻。工农业产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我们统购农产品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农民并不吃亏，而且收购的价格还逐步有所增长。我们向农民供应工业品方面，采取薄利多销、稳定物价或适当降价的政策，在向缺粮区农民供应粮食方面，一般略有补贴。但是就是这样，如果粗心大意，也还是会犯这种或那种错误。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合作社同农民的关系也要处理好。在合作社的收入中，国家拿多少，合作社拿多少，以及怎样拿法，都要适当。当遇到自然灾害以外，我们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使80%的社员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10%的社员收入增长不成，如有减少，也要及早想办法加以解决。

他强调：总之，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



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这是一个关系到六亿人民的大问题，必须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反复进行教育。

与之相联系的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毛泽东认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他说，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很注意的。他们的制度和我们的制度根本不同，但是他们发展的经验，还是值得我们研究。

他强调：可以和应当统一的必须统一，不可以和不应当统一的，不能强求统一。正当的独立性，正当的权利，省、市、地、县、区、乡都应当有，都应当争。这种从全国整体利益出发的争权，不是从本位利益出发的争权，不能叫做地方主义，不能叫做闹独立性。在这里，毛泽东所讲的实际上已经触及到政治体制的问题。

政治关系也讲了五个方面。

鉴于苏联的教训和我们自己的经验，毛泽东提出，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他说：“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我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就是骂我们的，我们也要养起来，在党内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这对党有益，